

有为政府赋能有效市场： 多元营商环境优化的异质性创新效应*

• 毛德凤 谢 冉 庆锦鸽
(安徽大学商学院 合肥 230601)

【摘 要】优化营商环境既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抓手，也是赋能企业创新，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 2020 年两万余家中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在厘清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发展现状与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多元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企业创新意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维度营商环境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政务服务评价中“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监管执法评价以及市场环境评价中“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改善对企业创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务服务评价中“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便捷”、法治保障评价以及市场环境评价中“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的改善尚未呈现明显的创新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的创新效应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生产率水平较高、获得政府补贴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主要通过制度性交易、物流、要素、税费和融资五大成本的减负效应，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意愿。为充分释放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能，更好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从政府治理层面来看，应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营造透明公正的法治保障环境，构建规范包容的监管执法环境，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企业发展层面来看，应精准对接财税支持政策，推动降本与创新双轮驱动，融入中小企业专属扶持体系，破解关键发展瓶颈，实施人力资本与数字化协同升级战略，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关键词】营商环境 企业创新 减负效应 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治理改革赋能县域经济韧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4CJY034）。

作者简介：毛德凤（1988—），副教授，主要研究财税管理与政策评估。谢冉（2001—），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税收与公司财务。庆锦鸽（2002—），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税收与公司财务。

通讯作者：毛德凤，E-mail: maodefenghust@163.com。

1. 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来，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成为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基石。《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能力排名跃居全球第 10 位，创新产出排名升至第 5 位，持续稳居高收入经济体首位，2013 年以来累计跃升 25 个名次，创新发展成效显著。根据全国工商联 2024 年统计数据，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达 600 万人，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承担了 50% 以上的研发投入，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这表明民营企业既是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然而，民营企业受限于规模偏小、融资渠道有限、核心技术储备不足等短板，抗风险韧性相对薄弱，正面临生产成本持续攀升、供应链关键环节受阻、国际市场准入壁垒高筑等多重现实压力。在此背景下，立足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核心定位，如何通过精准施策激活其创新活力，进而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核心动能，已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关键课题。

优良的营商环境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标尺，更是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增强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措施。2021 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提出，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十五五”规划建议稿进一步明确，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证实了中国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显著成就，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 2013 年的第 96 位大幅跃升至 2020 年的第 31 位，连续被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

随着《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令第 722 号）的全面落地及相关政策体系的持续深化，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紧扣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法治保障四大维度纵深推进，成为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牵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营商环境优化以“降本减负”为核心导向，旨在通过制度性改革持续减轻企业在制度性交易、物流、要素、税费、融资等关键环节的成本负担，形成精准协同的政策合力，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解缚、拓空间、增活力，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潜能。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以下问题：其一，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的营商环境优化战略能否有效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活力？多元维度下营商环境优化的企业创新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化特征？其二，成本减负如何构成营商环境驱动企业创新的核心传导机制？

与本文主题相关性较强的文献有以下两类：一类是营商环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有研究重点探讨了营商环境对城市发展格局（张劲松等，2020）、经济均衡发展（丁从明等，2024）、城市整体韧性（刘敏等，2025）、共同富裕（张茜松等，2025）等方面的促进效应。另一类是营商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营商环境对研发创新（Nam 和 Bao，2021；唐飞鹏和霍文希，

2022)、出口(戴翔和秦思佳, 2020)、生产率(Gogokhia 和 Berulava, 2021; 牛志伟等, 2023)、竞争力(张菀洺和杨广钊, 2022)、数字化转型(Luo et al., 2023)、企业生存(朱奕蒙和徐现祥, 2025)等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果。综合来看, 既有文献对营商环境的宏微观效应做出了积极探索, 但是关于营商环境的测度多数偏向省级或城市层面的综合指标构建与评估(李春涛等, 2024), 抑或从营商环境的单一要素或制度改革视角进行研究, 非常缺乏从微观层面的营商环境评价视角探讨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基于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创新性地以民营企业对所属地区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为切入点, 实证探究多元营商环境优化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意愿, 这对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既有研究普遍基于省级或城市层面构建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忽视了同一城市内部不同企业间的营商环境差异, 存在宏观层面研究的局限性。而本文以企业整体营商环境评价及其四大细分维度评价为切入点, 拓展了营商环境的测度方式及评价依据, 从微观企业视角丰富了营商环境的发展特征、薄弱短板与改进方向的经验证据, 弥补了既有研究在微观层面的不足。

第二, 为数不多的研究虽然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为对象, 但是主要以早期的调查事实为基础, 例如 2012 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 这就难以捕捉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营商环境制度优化的异质性效应。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系统探究企业层面营商环境及其细分维度评价的创新效应, 为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 推进营商环境精准优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

第三, 既有研究大多从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宏观维度剖析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对微观传导路径的探讨较为匮乏。而本文创新性地从成本减负这一微观视角切入, 系统揭示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在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传导效应, 为理解营商环境优化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决策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2.1 文献综述

2.1.1 营商环境的经济后果研究

营商环境概念最早起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随后学者从政务服务、法治环境、市场环境、金融服务、创新环境等维度开展了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构建与比较分析。近年来, 营商环境的经济后果研究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宏观层面, 既有文献主要基于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指数探讨了营商环境对产业升级、城市整体韧性、经济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丁从明等, 2024; 刘敏等, 2025; 张茜松等, 2025)。微观层面, 主要关注营商环境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Gogokhia 和 Berulava (2021) 发现经济监管环境、法律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活动, 进而提升生产率。周泽

将等 (2022) 利用熵值法构建省级营商环境综合指数, 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并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张菀洺和杨广钊 (2022) 基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构建营商环境指标, 发现营商环境通过打破原有寻租机制、提高市场效率提升民营企业竞争活力。牛志伟等 (2023) 发现营商环境优化通过人力资本升级、员工权益保护和提升员工信任度三种路径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张兆国等 (2024) 基于政务、市场、法治、公共服务和对外开放五大维度构建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发现营商环境通过提升创新活跃度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朱奕蒙和徐现祥 (2025) 发现减少准入审批通过提高企业初始生产率正向促进了新企业的长期生存。

2.1.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大维度探讨了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宏观政策层面, 主要包括数字经济发展 (Zhu et al., 202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Liu 和 Ma, 2020)、市场化改革 (潘珂和江旭, 2024)、产业政策 (Wang 和 Zou, 2018)、政府支出绩效评价 (常语萱和唐大鹏, 2023)、税收政策 (蔡伟贤等, 2022) 等, 这些均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微观企业层面, 主要包括数字化转型 (Zhuo 和 Chen, 2023)、ESG 表现 (李井林等, 2024)、企业家精神 (彭花等, 2022)、人力资本异质性 (Prokop et al., 2023)、企业社会责任 (Liu et al., 2021)、股权激励 (李连伟等, 2023) 等因素的激励效应。

2.1.3 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研究, 分别基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改革的营商环境特征考察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Nam 和 Bao (2021) 基于 2007—2015 年越南中小企业数据, 采用动态随机概率估计方法发现, 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Wang 等 (2023) 认为地区营商环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并且市场化程度越高, 创新效应越大。霍春辉和张银丹 (2022) 通过构建城市营商环境综合指标, 发现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提高市场竞争、改善融资约束提升上市公司创新质量。夏后学等 (2019) 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 发现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消除寻租,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周俊等 (2020) 认为新型政商关系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创新产出, 并且对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明显。李春涛等 (2024) 以企业注册信息构建城市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指数, 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两大路径显著促进企业创新。郭健等 (2025) 以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为自然实验, 发现税收营商环境通过增加税收横向公平渠道发挥了创新驱动效应。

综上所述, 关于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的研究, 通常聚焦于宏观层面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或是从市场化程度、行政审批效率、政商关系、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等单一维度评估营商环境优化的实施效果, 并且多以市场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鲜有文献从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的真实评价出发, 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因此, 本文以私营企业对地区营商环境及其细分维度评价为切入点, 实证探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 这不仅能规避营商环境指标设计的主观性局限, 而且能剥离出同一地区不同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差异, 从而补充营商环境优化赋能民营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

2.2 理论分析

优化营商环境是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当前，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逻辑已由依赖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部调整，转向以系统性制度创新为抓手的全局重构，逐步构建起“服务提质、监管提效、成本减负”的多维联动格局，其对市场主体的赋能效应不再局限于特定维度，而是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关键突破口，带动物流、要素、税费、融资等重点领域成本整体下行，进而形成相互关联、逐层传导的“成本链”机制。基于此，本文以制度性交易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与融资成本为分析主线，深入阐释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具体作用路径。

第一，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制度性交易成本被视为企业运营中的“隐性税负”，以“非生产性资源消耗”和“政策不确定性”为核心特征，本质是制度规则与企业经营活动之间的“互动摩擦”，其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创新的“制度门槛”。营商环境优化通过简政放权、升级政府服务、维护公平竞争等多维度举措，削减制度性摩擦与政策遵从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信号效应”，能够向市场主体传递制度环境持续优化、政府治理趋向规范透明的积极信号，进而通过释放束缚性资源、增强风险承担意愿、稳定发展预期等渠道，有效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向研发创新领域（詹新宇和余倩，2025）。

第二，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意愿。物流成本是企业运营的核心显性成本（如运输、仓储费用）与隐性成本（如时间损耗、供应链中断风险）的总和，尤其对制造业、零售业等依赖实体流通的行业影响显著。营商环境优化从完善基础设施网络、统一规范行业标准、提升市场运行效率、推广智慧物流体系等方面协同发力，有效降低企业在物流环节面临的制度性、结构性与技术性成本。物流成本的降低不仅直接释放了企业现金流与盈利空间，为研发创新提供更充裕的资金支持，而且通过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响应速度与协同效率，降低企业运营中的不确定性，进而为持续性、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与资源保障（何凌云和陶东杰，2018）。

第三，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要素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意愿。要素成本是企业为获取和使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其不仅直接反映企业经营的成本结构与效益水平，更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与长期发展质量的关键变量。营商环境优化并非直接干预要素价格，而是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降低要素获取的制度性摩擦，间接削减企业的综合要素成本。例如，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打破数据垄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畅通人才流动、落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减少企业跨区域获取各类要素的制度性壁垒。要素成本的降低，既能够拓宽企业利润空间，为研发创新积淀资金，又能通过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倒逼企业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型（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

第四，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税费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意愿。税费成本作为企业经营的核心刚性支出，其负担水平直接决定企业创新投入的资源空间与可持续性（唐飞鹏和霍文希，2022）。营商环境优化并非依赖单一的税费减免政策，而是通过结构性减税降费、办税流程数字化便利化、合规与

监管确定性提升等维度协同发力，从直接税额减免、间接办税成本压缩、隐性合规风险缓释三个层面，系统性降低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能够有效规范涉企收费、盘活企业现金流、稳定经营预期，在降低企业综合经营成本的同时提振企业投资信心，为企业创新意愿的培育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李建军和范源源，2023）。

第五，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意愿。企业研发活动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典型特征，充裕且低成本的资金是其突破短期收益约束、持续开展研发的核心前提（Brown et al., 2012）。营商环境优化主要通过健全金融服务体系、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强化政策风险分担、完善法治保障等综合举措，有效降低企业的利率成本、时间成本与担保成本，进而减轻企业融资负担。良好的融资营商环境有助于破解资本约束、稳定企业长期预期，推动企业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Darniamedani et al., 2018）。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实现减负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意愿。

3. 实证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该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区（未含港澳台地区），包含19个行业大类，问卷内容涵盖了企业经营业绩、创新转型、对外投资与出口以及整体营商环境评价等重要信息。为了提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删去企业研发投入、专利商标缺失的样本；排除营商环境、销售收入缺失的样本；排除企业年龄、员工人数等为0的样本。经过数据清洗后，共得到22078个有效样本对象。

3.2 模型设定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实证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激励效果。由于企业创新意愿为离散型变量，因此本文以Probit模型为基准模型。

$$\text{pr}(\text{rddum}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env}_{it} + \text{control}_{it} + \rho_j + \lambda_k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公式（1）中， i 表示企业， t 表示年份， j 表示省份， k 表示行业， ρ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λ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ε_{it} 为残差项。 rddum 表示企业创新意愿， env 表示营商环境评价水平。 control 是控制变量集合，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主受教育水平、企业主年龄、党组织身份、政治身份和党员身份。 α_1 是本文最关心的变量系数，预期其符号显著为正，意味着营商环境优化对激发企业创新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3.3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表 1 是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被解释变量来看，52.9%的企业有研发创新意愿。从解释变量来看，调查问卷中对营商环境分别设计了“明显改善”“有所改善”“一般”“改善不大”“完全没有改善”5 个类别。本文首先对问卷指标进行逆向处理，分别赋值 1~5，取值越大，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程度越大。综合来看，营商环境的平均值为 3.960，表明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有较为积极的评价。从企业特征因素来看，企业平均净资产总额为 885.4 万元，企业平均年龄为 13.834 年，企业主平均年龄为 43.704，企业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4.2，即达到本科教育程度；从企业身份特征来看，38.2%的企业设立了党组织机构，23.6%的企业主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36.3%的企业主具有中共党员身份。这些事实反映了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典型特征，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有助于准确探究营商环境的创新激励效果。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 别	变 量	指 标 定 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意愿	企业有研发投入=1，否=0	0.529	0.499	22078
解释变量	营商环境	整体营商环境改善程度，取值 1~5	3.960	0.908	22078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净资产总额对数	6.786	2.745	22078
	企业年龄	调查年份-注册时间+1	13.834	7.541	22078
	企业主受教育水平	初中以下=1，高中=2，大专=3， 本科=4，硕士=5，博士=6	4.180	0.902	22078
	企业主年龄	调查年份-出生年份+1	43.704	9.855	22078
	党组织身份	企业有党支部=1，否=0	0.382	0.485	22078
	政治身份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否=0	0.236	0.425	22078
	党员身份	中共党员=1，否=0	0.363	0.481	22078

4.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与创新意愿的典型事实分析

4.1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发展现状分析

4.1.1 企业营商环境整体评价分析

营商环境整体评价指标来自调查问卷设计中“今年以来，您觉得下列情况的改善程度如

何?”。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认为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有所改善”“一般”“改善不大”和“完全没有改善”的占比分别为30.5%、42.8%、19.8%、5.9%和1.0%。综合来看，70%以上的企业认为营商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近30%的企业认为营商环境改善不明显。这意味着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实施的营商环境优化系列政策，总体上得到了民营企业较为广泛的肯定，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能否赋能民营经济创新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严谨评估，并需要明确营商环境优化的难点、堵点和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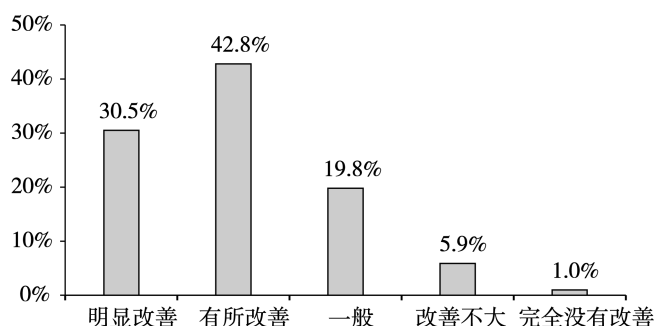


图1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整体评价分析

4.1.2 营商环境细分维度评价分析

民营企业调查问卷中还设计了企业对营商环境细分维度的评价，主要包括“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简捷”“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政府部门不担当、不作为”“市场监管部门运动式执法”“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和“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对上述细分指标分别设计了“明显改善”“有所改善”“一般”“改善不大”“完全没有改善”5个选项。本文依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政策内容设计，将以上指标分别对应《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的政务服务、法治保障、监管执法和市场环境四大维度。具体如下，以“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简捷”和“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反映政务服务评价、以“政府部门不担当、不作为”（主要指政策执行不力、企业权益无法保障）反映法治保障评价、以“市场监管部门运动式执法”反映监管执法评价，以“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反映市场环境评价。

表2的结果显示，对“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简捷”“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持改善评价的企业占比分别为81.6%、78.3%，这表明政务服务环境整体上得到了切实改善，简政放权改革受到企业广泛的积极评价。认为“政府部门不担当、不作为”“市场监管部门运动式执法”明显改善或有所改善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3.2%、68.1%，这表明法治保障和监管执法整体上也能够获得企业肯定。而认为“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得到改善的企业占比分别为57.2%、44.8%，这意味着企业融资难缓解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多样化融资渠

道尚有较大发展空间。综合来看，民营企业认为营商环境向好程度依次为政务服务、法治保障、监管执法和市场环境。

表 2 营商环境细分维度评价分析

四大维度	细 分 指 标	明显改善	有所改善	一般	改善不大	完全没有改善
政务服务评价	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简捷	40.7%	40.9%	13.0%	4.2%	1.2%
	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	36.1%	42.2%	15.8%	4.5%	1.4%
法治保障评价	政府部门不担当、不作为	33.2%	40.0%	16.5%	5.5%	4.8%
监管执法评价	市场监管部门运动式执法	28.2%	39.9%	21.1%	5.8%	5.0%
市场环境评价	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	22.2%	35.0%	22.9%	11.5%	8.4%
	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	18.4%	26.4%	28.6%	11.8%	14.8%

4.1.3 不同地区营商环境评价分析

表 3 报告了我国三大区域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结果。从创新企业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的比例分别为 76.1%、77.7%、74.2%，东部和中部地区高于总体营商环境改善比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从非创新企业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的比例分别为 71.4%、71.5%、68.8%，东部和中部地区高于总体营商环境改善比例，西部地区同样低于总体水平。表 4 报告了我国三大区域营商环境评价的均值差异检验结果。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营商环境评价均值高于总体水平，而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评价均值低于总体水平。这意味着东部、中部地区的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的满意度要高于西部地区。从均值差异检验结果来看，在总体样本和三大区域中，创新企业与非创新企业之间的均值差异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创新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主观感知和评价要优于非创新企业，初步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可能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意愿。

表 3 不同地区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分析

改善程度	创 新 企 业				非创新企业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明显改善	31.7%	31.6%	33%	30.5%	29.2%	29.2%	30.4%	28.5%
有所改善	44.3%	44.5%	44.7%	43.7%	41.2%	42.2%	41.1%	40.3%
一般	17.7%	17.7%	17%	18.1%	22.1%	22.2%	21.3%	22.5%
改善不大	5.4%	5.4%	4.7%	6.2%	6.4%	5.7%	6.1%	7.4%
完全没有改善	0.9%	0.8%	0.7%	1.4%	1.1%	0.7%	1.1%	1.3%

表 4 不同地区营商环境评价的均值差异检验

类别	创新企业		非创新企业		均值差异检验
	营商环境评价均值	样本数	营商环境评价均值	样本数	
总体	4.004	11692	3.910	10386	0.094*** [0.000]
东部	4.007	5387	3.934	3998	0.073*** [0.000]
中部	4.045	3152	3.935	2285	0.109*** [0.000]
西部	3.956	3153	3.872	4103	0.084*** [0.000]

注：*** 表示均值差异在 1%水平上显著，方括号内为 P 值。

4.2 民营企业创新信心提振的制约因素分析

企业家创新信心指标来源于问卷设计中“您认为哪些方面重要因素制约了企业家创新的信心？”，该指标设置“不敢冒险尝试创新”“创新缺乏紧迫性”“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缺乏创新理念、方法与工具”“缺少真正一流技术和人才”“政策支持不到位”和“国外技术封锁”7个选项（不限项）。结果显示，企业家认为制约其创新信心的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不敢冒险尝试创新”（13550）、“缺少真正一流技术和人才”（12192）、“缺乏创新理念、方法与工具”（7648）、“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4843）、“政策支持不到位”（3770）、“创新缺乏紧迫性”（3617）、“国外技术封锁”（1322），对应的占比分别为 61.4%、55.2%、34.6%、21.9%、17.1%、16.4%和 6.0%。这表明制约民营企业创新信心的主要因素是，创新风险意识不足，研发人才缺乏、创新理念与方法不充分、知识产权保护和政策支持不到位，因此，应重点围绕上述短板，加强营商环境制度建设，以提振企业家创新信心，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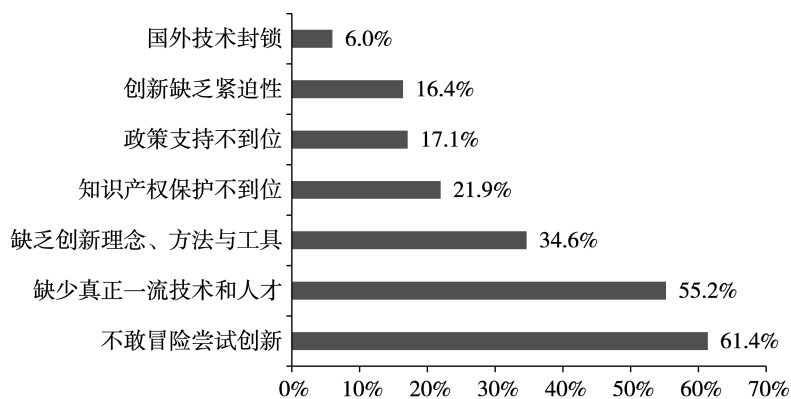


图 2 民营企业创新信心的制约因素分析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模型（1）对营商环境的创新激励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表 5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第（1）列在不纳入控制变量的情形下，考查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营商环境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4）列依次加入企业特征、企业主特征及企业身份特征变量后，发现营商环境变量仍保持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表明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意愿。从营商环境的边际效应来看，第（1）列的边际系数为 0.018，第（2）~（4）列的边际系数分别为 0.013、0.013、0.012。经济意义表明，营商环境每增加 1 个单位，企业创新意愿将会提高 1.2%。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边际系数的变化特征，印证了本文所选控制变量可有效缓解遗漏变量偏误，进一步增强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3)	(4)
营商环境	0.051 *** (0.016)	0.039 ** (0.016)	0.039 ** (0.016)	0.037 ** (0.016)
企业规模		0.096 *** (0.007)	0.090 *** (0.007)	0.085 *** (0.007)
企业年龄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企业主受教育水平			0.110 *** (0.014)	0.092 *** (0.013)
企业主年龄			0.000 (0.001)	-0.002 * (0.001)
党组织身份				0.151 *** (0.022)
政治身份				0.070 ** (0.029)
党员身份				0.101 *** (0.026)
常数项	0.265 *** (0.091)	-0.410 *** (0.112)	-0.898 *** (0.128)	-0.768 *** (0.126)

续表

变 量	(1)	(2)	(3)	(4)
伪 R^2	0.129	0.154	0.158	0.162
边际效应	0.018 *** (0.005)	0.013 ** (0.005)	0.013 ** (0.005)	0.012 ** (0.005)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2078	22078	22078	22078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级聚类标准误。下表同。

从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来看，规模较大企业通常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实力，能够承担更高的研发风险，从而展现出更强的企业创新意愿。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引入新理念、新技术，展现出更强的创新意识。具有党组织身份和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能够更及时捕获政策动向，把握发展机遇，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意愿。企业主越年轻，越可能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活力，创新动机通常更强烈。

5.2 营商环境细分维度评价分析

本文首先对营商环境六大细分指标的选项数值进行逆向处理，分别赋值1~5，取值越大，即营商环境的改善程度越大。表6报告了四大维度营商环境评价的创新效应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第（1）~（2）列为政务服务评价结果，其中“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简捷”评价结果的估计系数不显著，“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评价结果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在于，“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简捷”的改善虽能缩短办事成本，但是主要发生在企业新创环节，难以对创新审批程序等创新环节产生显著的促进效果；而“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的改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减弱非法设租、权力寻租和抽租等方面的消极影响，降低企业的公关招待时间和成本，进而有助于企业增加生产性活动，促进企业创新。第（3）列法治保障评价结果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政府部门不担当、不作为”评价结果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激励效果尚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既有法治环境更多侧重于保护既有产权、简化流程等基础层面，而企业创新的核心需求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融资权益保障等高端法治供给仍不足，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第（4）列中监管执法评价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市场监管部门运动式执法”的改善程度越高，越能够显著提升创新意愿。规范化监管执法既可以消除企业创新阻碍、减少创新干扰，又能稳定市场预期，进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第（5）~（6）列为市场环境评价结果，其中“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评价结果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评价结果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国有银行融资具备低成本、长期限的特点，契合创新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性，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信贷风险，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相较于国有银行贷款，民间渠道融资成本高、期限短、

信贷风险大，且其服务对象多为小微企业，融资改善仅能缓解生存压力，难以转化为创新动力。

表 6 营商环境四大维度的创新效应

变 量	(1)	(2)	(3)	(4)	(5)	(6)
	政务服务评价		法治保障评价	监管执法评价	市场环境评价	
营商环境	0.025 (0.017)	0.038** (0.016)	0.017 (0.012)	0.039*** (0.012)	0.019** (0.009)	0.003 (0.009)
常数项	-0.720*** (0.128)	-0.770*** (0.127)	-0.690*** (0.110)	-0.773*** (0.123)	-0.695*** (0.111)	-0.635*** (0.119)
伪 R ²	0.161	0.162	0.161	0.162	0.161	0.161
边际效应	0.008 (0.005)	0.013** (0.005)	0.005 (0.039)	0.013*** (0.004)	0.006** (0.003)	0.001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2078	22078	22078	22078	22078	22078

5.3 异质性分析

5.3.1 数字化转型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释放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动能（Ferreira et al.，2019）。本文根据问卷设计中“您企业当前的数字化程度”将总样本划分为低数字化转型、高数字化转型两个组别。表 7 第（1）～（2）列报告了数字化转型视域下营商环境的创新激励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无论企业数字化程度高低，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边际效应来看，高数字化转型组的回归系数要高于低数字化转型组。这一发现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增强技术外溢等途径，有效赋能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并且较高的数字化水平能够强化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政策含义表明，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协同推动民营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以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为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5.3.2 劳动生产率

生产率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牛志伟等，2023）。本文借鉴 Zwick 和 Mahon（2017）、蔡庆丰等（2021）的研究思路，使用销售收入与员工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劳动生产率，并根据劳动生产率将总样本进行三分组，劳动生产率最低的组别为低生产率组，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组别为高生产率组。表 7 第（3）～（4）列报告了营商环境对不同劳动生产率企业创新意愿的异质

性效应，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了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的创新意愿，对低劳动生产率企业的创新意愿没有显著效果。主要原因在于，高劳动生产率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能够增强企业创新投入所需的持续性资金支持，为提振企业创新发展信心奠定坚实基础，从而呈现突出的创新激励效应。政策含义表明，应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升民营企业生产率水平，从而发挥自主创新与生产率进步的协同效应。

表 7 异质性分析：基于数字化转型和劳动生产率的检验

变 量	(1)	(2)	(3)	(4)
	低数字化转型	高数字化转型	低劳动生产率	高劳动生产率
营商环境	0.035 * (0.019)	0.040 * (0.021)	0.013 (0.023)	0.055 *** (0.021)
常数项	-0.829 *** (0.151)	-0.423 * (0.223)	-0.660 *** (0.222)	-0.740 *** (0.187)
伪 R^2	0.138	0.182	0.079	0.220
边际效应	0.011 * (0.006)	0.012 * (0.006)	0.004 (0.008)	0.016 ***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3278	8800	7035	8008

5.3.3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影响研发创新决策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不同规模企业在资源禀赋、风险承担能力与创新成本分摊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对企业创新意愿产生不同影响（何凌云和陶东杰，2018）。本文根据企业净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将总样本进行三等分组，最低的组别为小型企业，最高的组别为大型企业。表 8 第（1）～（2）列报告了营商环境对不同规模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大型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小型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虽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营商环境优化能显著提升大型企业的创新意愿，而对小型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相对有限。究其原因，大型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储备、丰富的人才资源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营商环境优化背景下能够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快速做出创新决策并落地实施。而小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市场、人才等诸多瓶颈，营商环境优化难以有效弥补其创新关键要素的供给缺口。政策含义表明，应简化创新审批程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拓宽创新支持领域，营造稳定、公平、高效的创新环境。

5.3.4 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Howell，2017），政府补贴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试错风险，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本文根据问卷设计中“获得政府各类补贴”将总样本划分为获得政府补贴、未获得政府补贴两个组别，表 8 第（3）～（4）列的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获得政府补贴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未获得政府补贴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获得政府补贴能够增强营商环境的创新激励效应。可能原因在于，政府补贴能够扩大企业现金流和融资水平，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创新信心，进而产生协同激励效应。政策含义表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加大涉企补贴资金公开力度，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表 8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规模和政府补贴的检验

变 量	(1)	(2)	(3)	(4)
	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获得政府补贴	未获得政府补贴
营商环境	0.032 (0.022)	0.055 *** (0.019)	0.018 (0.015)	0.044 * (0.024)
常数项	-0.876 *** (0.197)	-0.777 *** (0.221)	-0.535 *** (0.150)	-0.584 *** (0.166)
伪 R^2	0.084	0.200	0.115	0.160
边际效应	0.011 (0.008)	0.016 *** (0.005)	0.006 (0.005)	0.013 * (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7285	7506	10937	11141

5.4 内生性检验

5.4.1 工具变量法检验

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既可能是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了企业创新，也可能是创新意愿强的企业选择了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因而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解决两者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董志强等（2012）的研究思路，选取“开埠通商历史”作为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开埠通商历史反映了地区在长期对外开放进程中形成的制度路径依赖，有利于培育契约精神

与市场规则，从而为营商环境的开放性与规范化奠定历史基础，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开埠通商源于近代历史制度安排与宏观对外战略，与企业当期创新行为不存在直接关联，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在具体测度上，开埠通商历史采用 1840 年至清末期间各地区开埠通商时点至研究样本期的累计年数，并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表 9 报告了工具变量法检验的估计结果。第（1）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开埠通商历史对营商环境的估计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历史禀赋对当前地区营商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2）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系数仍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支持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创新的核心结论。从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来看，第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10.44，且 P 值为 0.0000，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 Wald 检验结果显著，表明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意愿之间存在内生性偏误，印证了采用工具变量法的必要性。此外，考虑到单一工具变量可能带来的潜在偏误，我们进一步采用 Weakiv 方法开展稳健推断，结果显示，Anderson-Rubin（AR）检验在 1% 水平上高度显著（ $\chi^2(1) = 44.53$ ， $P = 0.0000$ ），证明本文结论不受弱工具变量偏误影响。综上，在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基准结论依然稳健，充分证实了营商环境创新激励效应的研究假说成立。

表 9	工具变量法检验	
变量	(1)	(2)
营商环境		4.122 ** (1.796)
IV	0.158 ** (0.065)	
F 值	10.44 [0.0000]	
Wald 检验		480.66 [0.0000]
AR 检验		44.53 [0.0000]
样本数	18082	18082

注：方括号中为 P 值。 F 值为第一阶段弱工具变量检验统计量，Wald 检验为第二阶段内生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检验，AR 检验为弱工具变量稳健的 Anderson-Rubin 检验。

5.4.2 蒙特卡洛模拟检验

为避免基准回归结果受到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的潜在影响，本文借鉴彭飞等（2020）的研究思路，基于蒙特卡洛模拟方法，通过对营商环境的随机化处理来评估是否存在显著的创新效应。具体

而言，本文实施了 500 次的随机抽取，每一次抽取后都构建了新的虚拟变量，并将其纳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图 3 展示了模拟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模拟回归系数服从以 0 为中心的正态分布，且基准回归系数估计值位于这一分布的高尾部。据此可以判断，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并非偶然产生，而是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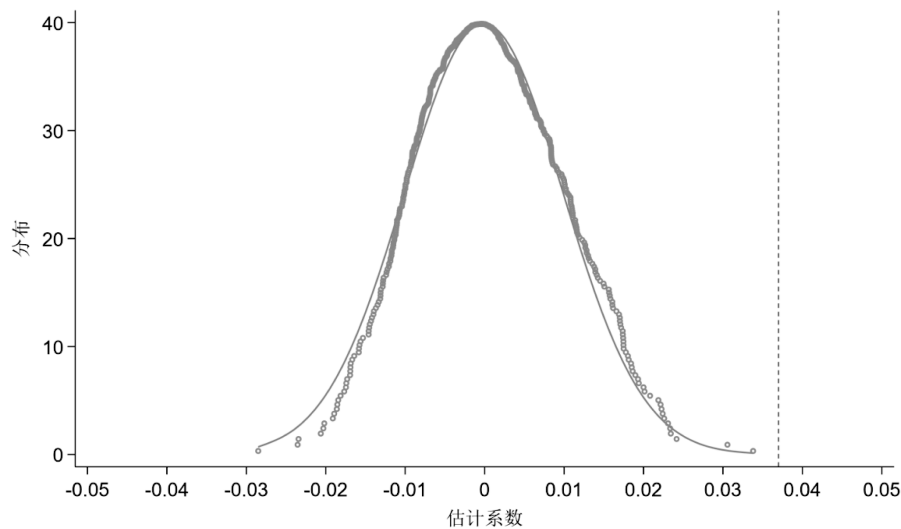


图 3 蒙特卡洛模拟检验

5.4.3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

营商环境评价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评价的差异并非随机产生，这可能导致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选择性偏差。为了克服这一难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两组：一组是整体营商环境改善程度评价良好的企业（实验组），另一组是整体营商环境改善程度评价不佳的企业（控制组）。通过计算每家企业的倾向得分，以确保两组企业在关键特征上具有可比性。在样本匹配之前，还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使得匹配后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小于 10%，且 t 统计量不显著，才能确保匹配变量选择恰当，匹配方法有效。表 10 展示了多种匹配方法的检验结果，发现平均处理效应（ATT）的估计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创新意愿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表 10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

匹配方法	ATT
一对一近邻匹配	0.036*** (0.010)
核匹配	0.037*** (0.008)

续表

匹 配 方 法	ATT
半径匹配	0.071 ^{***} (0.004)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029 ^{***} (0.010)
马氏匹配	0.050 ^{***} (0.009)

5.5 稳健性检验

为了加强对关键变量度量及遗漏变量的敏感性分析，本文从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替换检验方法、控制省份-行业固定效应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 11 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首先，替换营商环境的衡量方式，第（1）列以整体营商环境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将问卷中“明显改善”和“有所改善”定义为 1，将“一般”“改善不大”和“完全没有改善”定义为 0。第（2）~（4）列分别以市场化指数、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地区营商环境得分衡量营商环境水平。其次，替换企业创新的衡量方式，第（5）列将问卷中“新增投资的主要方向有？”的选项“新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工艺改造”设为 1，其余设为 0。第（1）~（5）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营商环境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替换检验方法，第（6）列采用 Logit 模型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最后，控制省级层面特征与固定效应，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第（7）~（8）列依次加入了省份-行业固定效应，以及人均 GDP、产业结构、财政支出占比、教育水平等省级层面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创新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不太可能受到变量测度、遗漏重要因素、研究方法敏感性等方面的干扰，证实了营商环境改善具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

表 11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1)	(2)	(3)	(4)	(5)	(6)	(7)	(8)
营商环境	0.097 ^{***} (0.028)	0.031 ^{***} (0.004)	0.046 ^{***} (0.006)	0.004 ^{***} (0.001)	0.028 ^{**} (0.014)	0.062 ^{**} (0.027)	0.034 ^{**} (0.016)	0.037 ^{**} (0.016)
伪 R^2 / R^2	0.162	0.161	0.161	0.161	0.116	0.162	0.180	0.1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2078	22078	22078	22078	22078	22078	21921	22078

5.6 机制讨论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优化营商环境可能会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因此，本文通过构建机制变量，从减负效应角度揭示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机制。

本文以调查问卷中“今年贵企业下列成本的变化总体趋势是？”测度企业成本感知情况，以“到政府办事（工商注册、行政审批等）的时间和费用”“物流成本”“能源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的变化趋势分别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以上变量分别设计了“明显降低”“有所降低”“没有变化”“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5 个选项，对此首先进行数据量化处理，分别赋值 1~5，数值越大，成本越高。表 12 报告了机制检验的实证结果，估计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而减轻企业成本负担，既能够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又可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李林木和汪冲，2017），这也印证了减负效应是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渠道。

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成立，其主要逻辑体现如下：其一，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减少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时间和资源消耗。这使得企业能够更专注于核心业务和创新活动，从而提升了创新意愿。其二，良好的营商环境通常伴随着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环境，减少了企业在合规和应对政策不确定性方面的成本，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投入创新活动中。其三，要素成本和税费成本的降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为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其四，优化营商环境通常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和融资渠道的拓宽，使得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资金支持，进而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能力和意愿。

表 12 机 制 检 验

变 量	(1)	(2)	(3)	(4)	(5)
	制度性交易成本	物流成本	要素成本	税费成本	融资成本
营商环境	-0.207 *** (0.008)	-0.043 *** (0.010)	-0.056 *** (0.009)	-0.148 *** (0.010)	-0.147 *** (0.010)
常数项	3.793 *** (0.069)	3.385 *** (0.060)	3.537 *** (0.087)	3.423 *** (0.085)	3.574 *** (0.069)
调整 R ²	0.077	0.038	0.019	0.053	0.0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2078	22078	22078	22077	22078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20 年 2 万余家中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剖析了我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的典型特征，考察了多元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激励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上述结论在经过度量方式、研究方法和遗漏变量等敏感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务服务评价中“政府官员勤政、积极服务企业”、监管执法评价以及市场环境评价中“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改善对企业创新意愿具有积极影响，而政务服务评价中“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便捷”、法治保障评价以及市场环境评价中“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的改善对企业创新意愿尚未形成显著的促进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数字化水平高、劳动生产率较高、获得政府补贴和大型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意愿。

6.2 政策建议

优化营商环境既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抓手，也是赋能企业创新，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为充分释放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能，更好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本文从政府治理与企业发展两个维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从政府治理层面来看：第一，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一是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政务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三是建立政务服务评价和考核机制，将评价结果与部门考核挂钩，切实降低企业办事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提高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第二，营造透明公正的法治保障环境。一是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侵权认定标准和赔偿额度，让企业创新成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二是建立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力度，缩短纠纷解决周期、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夯实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第三，构建规范包容的监管执法环境。一是推进监管执法标准化建设，明确监管执法流程和裁量标准，减少企业因规则模糊产生的额外合规成本。二是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提升监管精准度和效率。三是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对新技术、新产业设置“观察期”，建立创新容错机制，为企业创新试错提供空间，稳定创新预期。第四，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是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项制度规则，着力破除各类不合理限制，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二是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充分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在要素获取、政策扶持、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三是完善多元融资体系，推进精准有力的金融市场改革，着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拓宽企业创新空间。

从企业发展层面来看：第一，精准对接财税支持政策，推动降本与创新双轮驱动。企业应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跟踪与适配机制，密切关注财税优惠政策，如减税降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精特新”专项奖补等，以有效降低经营成本、改善现金流，从而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动力。第二，融入中小企业专属扶持体系，破解关键发展瓶颈。企业需高度重视并积极利用国家针对中小企业出台的专项扶持政策，如《关于加强财税支持政策落实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预〔2023〕76 号）等，精准缓解融资约束、获取定向补贴、接入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切实破解发展中的具体痛点与实际难题，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第三，实施人力资本与数字化协同升级战略，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必须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内部培育与外部引进，提升全员数字技能水平，构建适配研发创新与智能化运营的专业人才梯队。同时推动技术革新与管理创新深度融合，以生产率的持续提升驱动成本降低与效率优化，最终以生产率进步赋能企业提质增效。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局限，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化：

第一，本文采用 2020 年私营企业截面调查数据，受限于数据可得性，难以全面刻画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动态演化特征，也无法有效识别两者在时序上的互动机制，同时截面数据固有的内生性问题仍需在后续研究中予以更审慎的处理。未来研究可借助追踪调查数据，进一步探讨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长期动态关联及其时变特征。

第二，本文对营商环境的测度主要依赖企业主的问卷评价数据，受当前数据精度所限，在量化企业对多元营商环境优化的异质性感知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通过优化问卷设计、结合多源数据等方法，构建更为系统、多层次的营商环境综合评价体系，从而更细致地揭示多元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效应。

◎ 参考文献

- [1] 蔡庆丰，王瀚佑，李东旭．互联网贷款、劳动生产率与企业转型——基于劳动力流动性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1（12）．
- [2] 蔡伟贤，沈小源，李炳财，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J]．财政研究，2022（5）．
- [3] 常语萱，唐大鹏．政府支出绩效评价与企业创新[J]．南开管理评论，2023，26（2）．
- [4] 戴翔，秦思佳．营商环境优化如何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J]．国际贸易问题，2020（11）．
- [5]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2（4）．

- [6] 丁从明, 王聪, 陈昊.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南北经济均衡发展——限制经济秩序向开放经济秩序的演进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 (1).
- [7] 郭健, 马伟晴, 刘金东.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税收公平与耐心资本——来自税收“放管服”改革的证据 [J]. 财政研究, 2025 (8).
- [8] 何凌云, 陶东杰. 营商环境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 (3).
- [9] 霍春辉, 张银丹. 水深则鱼悦: 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J]. 中国科技论坛, 2022 (3).
- [10] 李春涛, 闫宇聪, 李嘉琪. 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来自工商注册数据的证据 [J]. 产业经济评论, 2024 (1).
- [11] 李建军, 范源源.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能否激励企业创新? [J]. 科研管理, 2023, 44 (8).
- [12] 李井林, 阳镇, 陈劲. ESG 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J]. 管理工程学报, 2024 (5).
- [13] 李连伟, 纪骁鹏, 吕镛, 等. 股权激励计划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J]. 科研管理, 2023 (12).
- [14] 李林木, 汪冲. 税费负担、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来自“新三板”挂牌公司的经验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7, 52 (11).
- [15] 刘敏, 朱亚鹏, 肖霞, 等. 公共数据开放如何提升城市韧性——基于城市政府治理和营商环境的视角 [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5, 14 (5).
- [16] 牛志伟, 许晨曦, 武瑛.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J]. 管理世界, 2023, 39 (2).
- [17] 潘珂, 江旭. 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J]. 科研管理, 2024, 45 (2).
- [18] 彭飞, 许文立, 吕鹏, 吴华清. 未预期的非税负担冲击: 基于“营改增”的研究 [J]. 经济研究, 2020, 55 (11).
- [19] 彭花, 贺正楚, 张雪琳. 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J]. 中国软科学, 2022 (3).
- [20] 唐飞鹏, 霍文希.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创新质量——基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J]. 财政研究, 2022 (12).
- [21] 夏后学, 谭清美, 白俊红.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9, 54 (4).
- [22] 张劲松, 卢兆梅, 詹圣泽, 等. 营商环境优化与城市空间格局的提升——以厦门为例 [J]. 中国软科学, 2020 (10).
- [23] 张茜松, 张莹莹, 孙宁, 等. 营商环境驱动城市共同富裕的多元路径研究 [J]. 科研管理,

2025, 46 (9).

- [24] 张菟洺, 杨广钊. 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J]. 财贸经济, 2022, 43 (10).
- [25] 朱奕蒙, 徐现祥. 创业营商环境、市场准入与企业长期生存 [J]. 财贸经济, 2025, 46 (9).
- [26] 张兆国, 徐雅琴, 成娟. 营商环境、创新活跃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J]. 中国软科学, 2024 (1).
- [27] 周俊, 张艳婷, 贾良定. 新型政商关系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42 (5).
- [28] 詹新宇, 余倩.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企业创新: 来自研发加计扣除流程简化的经验证据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5, 45 (7).
- [29] 周泽将, 雷玲, 伞子瑶. 营商环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机制分析 [J]. 财政研究, 2022 (5).
- [30] Acemoglu, D. , 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 (6).
- [31] Brown, J. R. , Martinsson, G. , Petersen, B. C. Do financing constraints matter for R&D?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2, 56 (8).
- [32] Darnihamedani, P. , Block, J. H. Hessels, J. et al. Taxes, start-up costs,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8, 51 (2).
- [33] Ferreira, J. J. M. , Fernandes, C. I. , Ferreira, F. A. F. To be or not to be digital, that is the question: Firm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9, 101.
- [34] Gogokhia, T. , Berulava, G. Business environment reforms, innov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 Eurasian Business Review, 2021, 11 (2).
- [35] Howell, S. T. Financing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R&D gran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 (4).
- [36] Liu, Q. , Ma, H.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 (127).
- [37] Liu, Y. , Chen, Y. , Ren, Y. , et al. Impact mechanism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308).
- [38] Luo, Y. , Cui, H. , Zhong, H. , et 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57).
- [39] Nam, V. H. , Bao Tram, H.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on persistence: The case of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Vietnam [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21, 30 (3).
- [40] Prokop, V. , Gerstlberger, W. , Zapletal, D. , et al. Do we need human capital heterogeneity for

-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novativeness? Insights from European catching-up territories [J]. *Energy Policy*, 2023 (177).
- [41] Wang, N. , Cui, D. , Dong, Y. Study on the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privat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J].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2023, 2 (1).
- [42] Wang, X. , Zou, H. Study on the effec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policy type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 [J]. *Energy Policy*, 2018 (122).
- [43] Zhu, S. , Hagedoorn, J. , Zhang, S. , et al.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distance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heterogeneous technological orientations [J]. *Technovation*, 2021 (106).
- [44] Zhuo, C. , Chen, J. 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vercome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dilemma: Effect, mechanism and effective boundary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3 (190).
- [45] Zwick, E. , Mahon, J. Tax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Investment Behavior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 (1).

**Empowering an Effective Market Through Proactive Governance:
The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 Effects of Diverse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s**

Mao Defeng Xie Ran Qing Jing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bstract: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a key approach to stimulat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enhanc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empower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ore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over 20, 000 private firms in China in 2020, this study delineat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diverse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willingnes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verall improvement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enhance corporate innovation willingness, although the effects vary considerably across different dimensions. Specifically,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diligence and active service to enterprises” in the eval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he evaluation of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ease of obtaining loans from state-owned banks”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whereas the improvement of “mor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procedures” in the eval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he evaluation of legal environment,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ease of raising funds from private channels”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do not exhibit

notable innovation incentiv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novation effect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re more pronounced in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reater productivity, those receiv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larger-scale firms. Mechanism tests suggest that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s primarily boost innovation willingness by alleviating cost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logistics, factors, tax, and financing expenses. To fully unleash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better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proactive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governments shall develop streamline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build a transparent and impartial law-based business ecosystem, form standardized and inclusive regulatory regimes, and foster a marketplace with fair competition. From the enterprise's perspective, enterprises should fully tap into targeted fiscal and tax support policies, take cost reduction and innovation as dual engines of growth, access special support schem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resolve major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and implement a coordinated upgrading strategy covering human capital and digital advancement to boos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Corporate Innovation; Burden Reduction; Proa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Market

责任编辑：路小静